

# 網絡媒體和連結型行動的力量與挑戰： 以 2014 香港雨傘運動為例

李立峯\*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教授

## 摘要

2014 年底的雨傘運動，除了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公民抗命，亦具備新社運模式網絡社會運動（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和連結型行動（connective action）的特徵，包括以網絡媒體作為溝通協調的科技基礎。本文指出，網絡媒體和連結型行動一方面容許更多人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參與，從而壯大運動的聲勢，但另一方面亦可以因其非中心化的傾向而增加運動組織者跟當權者進行策略性博弈的難度。通過分析現場調查所得數據，本文展示運動參與者的網絡媒體使用和活動狀況。分析顯示越活躍於網絡媒體的參與者對現場占領行動的參與程度越高，但現場參與程度越高的參與者傾向不願意在運動策略問題上聽取主要組織者的意見。分析結果指出網絡媒體及連結型行動對社會運動帶來的助力和挑戰。

**關鍵詞：**網絡社會運動、連結型行動、非中心化傾向、網絡媒體、雨傘運動

---

\* Email: b200152@mailserv.cuhk.edu.hk

投稿日期：2015 年 6 月 15 日

接受日期：2015 年 10 月 17 日

## 壹、引言

2014年9月28日凌晨，在持續了一個星期的學生罷課和示威活動之後，在香港已經醞釀接近兩年的占領中環行動終於由「占中三子」之一，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庭宣布正式開始。在占中三子的計劃中，占領中環是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為。由於害怕暴力事件發生會令運動失去合法性和民意支持，占中發起人的原意是要求參與者有高度紀律，如在9月26日，占中三子發表「抗命手冊」，當中就提出非暴力抗命的八大守則，包括「堅持非暴力抗爭方式，面對執法者和反占中人士，不作出傷害他人身體、心靈和財物的言行」、「被捕時組成人鏈臥地以顯示不合作，但不作強力掙扎，免雙方受傷」、「即使遭受暴力也凜然以對，不會以暴力還擊」、和「尊重『和平占中』決策中心的決定」等<sup>1</sup>。

但占中三子料想不到的，是占領行動會在開始不久就蔓延至香港多個區域。行動模式亦變得多樣化。參與者以各自的方式和想像在占領區內進行社區建設。除了路障、資源中心，以及大專教師發起的流動教室之外，金鐘占領區內出現了風力發電裝置、自修室、連儂牆等，旺角占領區則有臨時關帝廟和教堂。參與者自發地以即場發揮的方式應付占領區的各種事態，例如以唱生日歌來回應反占領人士的挑釁。同時，參與者亦在占領區內進行個人化的行為和表達，如在水泥地上繪畫、在石壁上或天橋底種植等。占領街道不止向政權表達不滿，占領區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理想社群生活的實驗場所。

隨著行動模式由強調紀律和行為一致性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轉化為較為個人化和非中心化的連結型行動（connective action），運動的名字亦由占領中環變為雨傘運動。行動形式的轉化一方面有助壯大運動的聲勢，因為連結型行動容許個人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參與，不要求參與者完全同意主要組織者的指引，這有助鼓勵更多市民投身到運動之中。但連結型行動亦可以為一場運動帶來困難和挑戰，原因是運動參與者之間以及參與者和主要組織者之間只有鬆散的連繫，參與者亦不一定願意服從主要組織者的決定和指示，這大大增加了運動組織者跟當權者進行策略性博弈時的難度。

事實上，這困難在占領行動開始後不久就已經浮現。10月21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的代表跟特區政府高級官員進行公開對話。在對話前，不少運動參與者已經在互聯網上聲言學聯並不能代表他們。在公開對話後，運動主要組

---

1 抗命手冊內容見 [http://oclp.hk/?route=occupy/activity\\_detail&activity\\_id=90](http://oclp.hk/?route=occupy/activity_detail&activity_id=90)

織者曾希望在占領區內進行投票，以得知參與者如何看待特區政府於公開對話中提到的幾點讓步以及運動未來的策略，但一些堅持抗爭到底的團體及參與者懷疑學聯和占中三子希望藉著投票為撤退作準備，強烈反對占領區公投。學聯和三子亦被逼取消投票。在之後的一個多月中，運動的支持者和參與者對是否應該撤退以及是否應該把行動升級有不同的意見，但運動的主要組織者一直未能提出明確的策略方向。

在上述背景之下，本文嘗試分析雨傘運動參與者的網絡媒體使用狀況，以及網絡媒體使用如何影響參與者對現場占領行動投入程度和對運動領導和策略的看法。網絡媒體是網絡社會運動 (Castells, 2009, 2012) 和連結型行動 (Bennett & Segerberg, 2013) 的科技基礎。在雨傘運動期間，參與者亦非常活躍地在互聯網上進行各式各樣的傳播和行動。本文的主要研究假設，是網絡媒體加強了運動參與者的現場參與程度，但同時使得運動參與者傾向不願意在運動目標上妥協，並傾向不願意接受運動中心組織者的領導。

筆者無意對運動組織者的策略選擇和參與者的行動模式作出規範性的評價。文章只是希望通過對經驗材料的分析，指出在新媒體時代，大型社會運動的模式和行動形態往往會附帶著連結型行動的特徵，而連結型行動的邏輯則會對運動的動態發展產生影響。本文的分析應該有助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參與者和觀察者瞭解新媒體和連結型行動邏輯可以怎樣影響社會運動。

以下的討論會先簡單回顧跟網絡媒體和社會運動的相關文獻，以及闡釋網絡社會運動和連結型行動兩個概念。文章之後討論雨傘運動的形態和發展，並通過結合文獻和案例特徵而提出研究問題和假設。研究結果部分分析筆者以及其研究團隊在 2014 年 11 月初於金鐘和旺角占領區進行的現場調查所得的數據。

## 貳、新媒體與社運 2.0：網絡社會運動和連結型行動

近年世界各地發生了多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由 2010 至 2011 年間的阿拉伯之春到 2011 至 2012 年間的占領華爾街，以及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和 2009 年冰島廚具革命等，都令觀察家對社交媒體的影響力刮目相看。國際傳媒中更出現了「臉書革命」(Facebook Revolution) 或「推特革命」(Twitter Revolution) 等說法。傳播學者傾向反對科技決定論，所以較少過分高估社交媒體的力量 (Olorunnisola & Martin, 2014)。傳播學者通常強調抗爭運動不會純粹因為新媒體科技而出現，但大部分學者亦同意，社交媒體在當今的大型抗爭運動中的確起

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Ems, 2014; Howard & Hussain, 2013; Kamel, 2014; Theocharis, 2013; Thorson et al., 2013; Tremayne, 2014)。如 Eltantawy & Wiest (2013: 1218) 就指出，在 2011 年的埃及革命中，「社交媒體引入了新的資源，使得資訊的接收和發放更加快速，幫助行動者之間建立和加強連繫，並促進了抗爭者之間以及抗爭者與世界之間的互動」。

事實上，早在社交媒體興起之前，社會運動研究者已經視互聯網為有力促進社會運動的新科技。這主要是因為互聯網降低了社會運動和集體行動的組織和動員成本，亦有助降低公民的資訊和參與成本 (Coopman, 2011; Lupia & Sin, 2003)。同時，由於主流傳媒深嵌於政治經濟結構當中 (Bagdikian, 2004; McChesney, 1999; Tuchman, 1978)，擔當著社會控制的功能，在報導抗爭行動時往往會有所偏頗，如強調暴力衝突、突顯抗爭者在言行或外表衣著上怪異的地方，卻少有論述抗爭者的議題和理念 (Boykoff, 2006; Chan & Lee, 1984; Gitlin, 1980; McLeod & Hertog, 1998; Small, 1995)。在這背景下，互聯網的出現就為社會運動提供了直接接觸支持者以至廣大民眾的平臺，而互聯網亦成為支持各類型社會運動的網絡另類媒體 (online alternative media) 的搖籃 (Atkinson, 2010; Forde, 2011; Leung & Lee, 2014)。

放到傳統社會運動理論中，互聯網可以使資源動員 (resource mobilization) 更有效率和效能 (Hara & Huang, 2011)。傳統的資源動員理論出現在 20 世紀 70 年代，為了反駁早年社會運動理論把社運的起源歸結於怨氣和結構張力之上，研究者強調社會運動是理性行為的產物，其中重點是要有人和組織把資源聚集起來 (Buechler, 2011; McCarthy & Zald, 1973, 1977)。資源不單只包括人力、金錢，和物資，亦包括如信任和 interpersonal 關係等社會資本，以及知識、公信力或權威等象徵和文化資本。通過互聯網，更大量的資源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被聚集起來。所以，互聯網其中一種重要的效果就是使社會動員和集體行動的規模變得更大。Earl & Kimport (2011) 稱之為超規模效應 (supersize effects)。

但比超規模效應更有趣的是互聯網可能會改變社會運動的形態。Earl & Kimport (2011) 稱之為理論 2.0 效應 (theory 2.0 effects)。傳統資源動員理論強調社會運動組織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是社會動員的核心。正規組織負責募集和分配資源、設置議程、規劃行動、培訓人材等。正規組織可以累積經驗和知識，可以用較長的時間來跟其他社會組織和持份者建立和維持關係，可以嘗試跟傳媒和新聞工作者多互動以建立自己的公信力和認受性，並在公共領域中成為自己所關注的議題的發言人 (Ryan, 1991; Rohlinger, 2002)。但隨著互聯網的

興起，平民百姓也可以自行組織及動員集體行動 (Harlow, 2012)。一些學者便指出互聯網可能成為「(正規)組織的代替品」(organizational substitute) (Buechler, 2011: 221)。而 Earl 及其合著 (Earl, Kimport, Prieto, Rush, & Reynoso, 2010: 441) 者則認為，如果研究者仍然假設只有社會運動組織才能製造抗議事件，那麼他們將忽略大量不是由正規組織發動的抗議行動。

不過，Earl & Kimport (2011) 的「理論 2.0」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兩位學者自己並沒有對具體的新社會運動形態有所描述或分析。相較之下，Castells (2012) 的網絡社會運動 (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s) 以及 Bennett & Segerberg (2013) 的連結型行動邏輯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則是對特定的新社運形態的理論建構。

Castells 早在 2001 年的著作中就已經提過網絡社會運動的概念 (Castells, 2001)，但只有到了 2009 至 2013 年間幾場引起全球關注的大型社會運動發生之後，Castells (2012) 才對網絡社會運動有更仔細和全面的描述。他認為 2009 至 2013 年間的幾場大型社運非常接近網絡社會運動的理想型 (ideal type)。這些運動所涉及的是一個由網絡構成的網絡 (network of networks)，所以運動的組織形態是非中心化的。「非中心化的結構把人們參與到運動中的機會擴至最大……同時它亦減低運動遇到打壓的風險，因為根本沒有具體的打壓對象」(同上引：221)。在行動模式方面，幾次網絡社會運動都以占領公共空間作為行動劇目的重心，但同時參與者在新媒體上有活躍的傳播和溝通行為，參與者亦因此為運動建構一個由城市空間和網路空間揉合而成的「自主空間」(space of autonomy)，而這自主空間使得運動可以一方面紮根本地，另一方面跟世界保持緊密的連繫。

在源起方面，網絡社會運動是自發的，但行動的號召卻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廣泛地流傳。行動緣起於一件令人感到義憤填膺的事件，令大部分人同時間對統治者感到厭惡，並願意以行動表達強烈不滿。這些網絡社會運動沒有領袖。雖然個別參加者可以對其他參與者有較大影響，而運動中亦往往會出現一些被眾多參與者關注的「小明星」(microcelebrities，參看 Tufekci, 2013)，但這些小明星並非領袖，參與者對他們的關注和正面評價的基礎，是他們不會把自己的想法和決定強加在別人和整個運動之上。運動的潛規則是「由運動中的人們來進行對運動的自治」(Tufekci, 2013: 223)。所以，這些運動亦常有內部直接民主的實踐。

除此以外，網絡社會運動有高度的反思性。參與者恆常地對運動自身以及對作為參與者的個人作出審視，思考「他們自己是甚麼人、渴望的是甚麼、希望

達致的是甚麼、想要的是甚麼樣的民主政制和社會」，以及如何避免在運動中複製他們希望改變的制度中所出現的，容易導致不平等和不公義的機制 (Tufekci, 2013: 225)。

最後一點，是這些運動沒有明確的政策綱領。它們不只是要求一些具體的政策轉變。它們的目標是改變社會的價值觀。「它們希望改變國家機器，但並不要求奪取國家機器。它們表達情感，激發討論，但並不產生政黨或支持個別政府，雖然它們也可能成為政黨和政府的政治市場推廣的對象」(Tufekci, 2013: 227)。

Castells (2012) 對新社運形態的描述，表面上的重點並不在互聯網的使用之上，但他認為互聯網是網絡社會運動出現的技術基礎，「因為人們只有在連繫了他人、分享了怒氣、感受到同在，以及為自己和社會建構了另類計劃時才能對抗支配。人們要連繫他人，就要靠互動性的傳播網絡，而在我們的社會中，大規模和橫向的傳播基本上就建立在互聯網和無線網絡之上」(同上引：229)。

Castells (2012) 的分析試圖勾劃出一種新型社會運動的基本特徵。值得在這裡先指出的是，現實上出現的網絡社會運動不一定同時擁有以上談論的所有特徵。我們可以用哲學家維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 (family resemblance) 準則來理解網絡社會運動這一概念範疇，即一個實際存在的運動，只要擁有以上談論的特徵的其中一部分，就已經可以被視為一場網絡社會運動。

相比之下，Bennett & Segerberg (2013) 更關注抗爭行動的參與、動員，和協調方式。Bennett 在較早年的文章中已經提出了「自我實踐的公民」(self-actualizing citizen) 的概念 (Bennett, 2008; Bennett & Segerberg, 2011)。傳統的公民概念強調公民責任，而公民對政治參與的責任則主要是指公民應該對制度化的政治有所參與，如在選舉中投票。而所謂自我實踐的公民，就是指人們不再局限於現行政治制度。他們希望通過更多樣化的政治行動來實現自己作為社群一份子的這個身分。所以，越來越多人投身如社會運動和抗議行動等非制度化的政治行動，而政治參與亦顯得越來越個人化。

在這背景和趨勢下，Bennett & Segerberg (2013: 25) 認為社會出現了一種新抗爭行動，這種新抗爭行動的特徵是動員速度高而且規模龐大、在組織形態上展現很高的彈性、有力建構具適應性的行動劇目、在意識上強調運動容納所有人的參與。兩位作者把這種行動稱為連結型行動。他們認為連結型行動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簡單而個人化的行動框架以及數位媒體網絡。個人化的行動框架使得所有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把自己視為運動的一份子，而數位媒體網絡不單使行動框架迅速流傳，亦使不涉及正規組織的行動組織和協調成為可能。

Castells (2012) 和 Bennett & Segerberg (2013) 可以說是在不同的層次上剖析了一種新型社會運動。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網絡社會運動和連結型行動的出現，不代表傳統以正規組織為重心的社會運動和集體行動會消失。例如 Anduiza, Cristancho, & Sabucedo (2014) 就分析了在西班牙於 2010 及 2011 年發生的 9 次抗爭行動，其中包括被 Castells 視為網絡社會運動案例之一的憤怒者運動。他們的研究指出憤怒者運動的確和其他 8 次抗爭行動不一樣，具備著連結型行動的特色，但同時，他們的研究亦正說明大部分實際存在的抗爭行動仍然保留著傳統以正規組織為中心的形態。在概念上，Bennett & Segerberg (同上引) 亦提出一種抗爭行動的三分法，分別為以正規組織為中心的集體行動、由群眾發起的連結型行動，以及由正規組織發起的連結型行動。

再進一步來說，無論是 Bennett & Segerberg (2013) 的三分法中的任何一個形態抑或是 Castells (2012) 的網絡社會運動，都是概念上的理想型。現實上出現的個別抗爭行動可能頗為接近這些新的理想型，但更多抗爭行動可能會摻雜著不同的組織形態和行動邏輯，不同的組織形態和行動邏輯之間可以有互補不足的地方，但也可以產生張力和矛盾。筆者認為，雨傘運動正是摻雜著不同行動邏輯的一場抗爭運動，而新媒體在雨傘運動中的作用和影響，亦可以通過它如何形塑不同組織形態和行動邏輯之間的關係來探討。

## 參、雨傘運動中的新媒體和行動邏輯

如文章開首指出，占領中環原本有嚴謹的行動規劃，但 9 月 28 日中午，當成千上萬市民到達金鐘，支持身處政府總部門外參與占領中環的人士時，香港警方卻封鎖前往政府總部的通道，令市民擁塞在金鐘主要道路的兩旁。到下午 4 時左右，一批示威者成功突破封鎖線，衝到馬路中心。結果，不少原本只是打算為占領行動打氣的市民，無意間親身參與了占領街道。到傍晚 6 時，警察向嘗試衝擊警方防線的示威者發射催淚彈，但催淚彈並未有效驅散人群。相反，警方向手持雨傘作防護的市民發射催淚彈的畫面，通過電視直播到達全香港市民家中，即時引發更大的義憤 (Tang, 2015)。直到晚上，警方共發放 87 枚催淚彈，但仍不能全面控制金鐘和灣仔區，而一些示威者為了令警方不能全面清場，於深夜時分將占領行動擴展至旺角和尖沙咀等地，形成占領行動「遍地開花」的局面，亦同時令整個運動的行動模式出現根本性的轉變。占領運動需要新的名稱。西方傳媒很快就用上了「雨傘革命」一詞。運動組織者和支持者則把雨傘革命改為雨傘運動，強調行動目的不在推翻政權，只在要求在香港落實「真普選」。

雨傘運動在幾個方面符合網絡社會運動和連結型行動的形態。首先，雨傘運動的行動劇目重心是占領公共空間，而運動參與者可說是建構了一個由城市空間和網路空間結合而成的自主空間。雨傘運動參與者多是自發動員的，和香港過去十多年出現過的，如七一遊行等大型遊行集會一樣，雖然集體行動由一些社會組織負責策劃和發起，但社會組織只具備有限的動員能力，大眾的參與是普羅市民之間相互動員的結果 (Lee & Chan, 2011)。

在多個占領區出現之後，占領運動出現明顯的非中心化傾向。當占中三子以至學生組織代表到其他占領區，嘗試跟參與者溝通和講話時，他們並不一定受到歡迎和禮遇。在占領區最前線的參與者和運動的中心組織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如設置路障時是否需要預留行車線讓應急車輛通過、應否堵塞政府總部上下班的出入口以阻止公務員上班等，往往有截然不同的意見，而中心組織者不一定能夠說服參與者聽從自己的勸喻。

運動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連結型行動的邏輯。正如占領華爾街行動以「我們是那 99%」作為簡單而有效的個人行動框架，雨傘運動的基本口號「我要真普選」也發揮類似的作用。口號沒有對真普選下明確定義，沒有強調如公民提名等具體方案，但正因如此，它使更多人願意支持和參與運動。同樣道理，黃絲帶和黃傘等運動的主要象徵符號，也沒有人對它們作嚴格的詮釋，令這些符號的開放性得以保存。在這背景下，這些符號和口號在互聯網上得到廣泛流傳，支持者和參與者可以在社交媒體上把自己的 profile picture 變為一把黃傘、一條黃絲帶，或其他類似的符號來表明運動支持者的身分。

同時，每個參加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參與和支持運動，不願意或因各種原因不能長期駐守占領區的市民，可以按個人狀況偶而到占領區作支持，或捐贈金錢或物資。另外，運動中一些最突出的行動往往由一些個人或小組發起，除了占領區內的活動，跟運動相關的行動也延伸到占領區外，例如一群參與者自發組織在獅子山頂掛上「我要真普選」的直幡，不只成為傳媒報導的焦點，亦觸發市民在不同場所掛上類似的直幡。到 11 月中開始的大學畢業典禮季節，很多畢業生都掛上黃絲帶和手持黃傘進典禮會場。所以，雨傘運動一方面是由一大群人同時在做同一件事情（占領街道），另一方面亦是很多個人和小組在做著模式不一樣，但相互連結在一起的事情。

不過，雨傘運動和網絡社會運動的概念形態始終有著重要的差異。雨傘運動並非沒有中心組織。占領中環的三位發起人在 2013 年 3 月已經開始了「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的一連串活動和工作，同時香港社會對占領中環以及公民抗命的



概念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廣泛討論，這些前期討論和籌備工作令更多市民瞭解公民抗命的原則和理念 (Lee, 2015)，亦形塑著人們對占領行動的理解和預期。在占領行動演變為雨傘運動之後，學聯和主要由高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的影響力更大於占中發起人，成為運動的主要組織及領導者。

雨傘運動不只有發起人和擔當領導角色的組織，運動亦可說確實需要領導者。這是因為雨傘運動跟占領華爾街或其他典型網絡社會運動另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有具體的政策訴求。剛剛提到，雨傘運動以沒有提及具體要求的「我要真普選」為口號，但同時運動的主要組織者的確提出了公民提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收回 8 月 31 日的決議案，以及特區政府重新啟動政改程序等具體要求。在運動過程中，亦有不同組織和人士提出過其他具體提議，如香港特區政府向全國人大提交補充報告，促請人大重新思考 831 決議案等。

一個沒有具體訴求的運動，要面對的問題可能只是如何將運動延續下去及將運動的訊息傳達給更多人知道，但當運動有具體訴求時，運動就必須與其主要訴求對象進行策略互動。例如在運動開展後不足一個月，就已經有運動支持者認為參與者需要考慮退場機制的問題。一些公開支持運動的公眾人物，如香港天主教教區前主教陳日君，在 10 月上旬已經呼籲學生撤退以保留實力，再跟政府談判。而在運動內部的另一端，則有參與者及團體呼籲占領行動須要升級以逼使政府作出具體讓步。

雨傘運動的組織者在當時應該採取甚麼策略並非這裡的討論重點。這裡要指出的是，這種策略選擇，是 Castells (2012) 筆下沒有政策綱領的網絡社會運動無須面對的。沒有具體政策要求，運動在某種意義上根本就沒有具體訴求對象，所以亦不需要跟訴求對象互動。但雨傘運動有具體訴求，於是便有了用甚麼策略才能達致最大成效，爭取到政府作出最大讓步的問題。而非中心化的連結型行動邏輯和形態，則可能加大運動組織者進行有效決策的難度，因為當運動內部意見紛紜，而人們又強調自己是獨立的個體參與者時，運動組織者採納任何果斷的行徑，都可能要承受著被部分參與者公開批評甚至唾棄的風險。

當然，一場運動能否取得成果，要看的不是運動的策略是否得宜，也要看運動處身於一個怎樣的機會結構之中 (Kolb, 2007)。雨傘運動在香港發生，但中央政府掌握著普選問題的決定權，而且一直在該問題上採取強硬的立場。同時，香港民主運動的「精英盟友」基本上只限於本地的民主派政黨和政客，連繫中港的政治架構中的「香港代表」，如特區政府官員、港區人大代表和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的香港成員，都是親中和建制派人士。另外，在法定的政制改革

過程中，沒有機制讓香港社會的聲音可以繞過特區政府或建制派精英直接進入政策制定過程。所以，政治機會結構本身就對兩傘運動要取得成果極為不利。因此，本文並不是指非中心化的連結型行動邏輯和形態是兩傘運動未能取得成果的最重要因素。但從另一角度看，正是因為政治機會結構本身已對運動不利，運動更加需要小心考慮自己的策略決定，而非中心化的形態則可能對此帶來額外的困難<sup>2</sup>。

## 肆、研究問題和假設

當然，上一節的討論只是基於概念性分析和筆者對兩傘運動的一些觀察，而文章正是希望通過對經驗數據的分析，來驗證以上提到的有關網絡媒體和連結型行動邏輯對兩傘運動的影響的說法。精確點說，本文中指的網絡媒體，泛指以互聯網技術作為基礎的媒體溝通工具，包括各種網站、網絡論壇、各種用作人際溝通的智能手機程式等。具體而言，本文提出兩個研究問題和三個研究假設。第一個研究問題純屬描述性質，我們希望瞭解運動參與者的網絡傳播行為。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為止，有關網絡社會運動或連結型行動的文獻並沒有建立一個通用的數位媒體行為分類方法。一些研究中提出的分類亦不一定適用於本研究的關注點之上，如一些關於社交媒體和政治參與的研究把社交媒體的使用分為接觸資訊、表達意見、行動參與等不同的維度 (Tang & Lee, 2013; Valenzuela, 2013)，但這些分類提出的是較為籠統的日常社交媒體使用的維度，不一定適用於一場特定的社會運動中。另一種針對網絡媒體使用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的分析，則主要是通過研究從社交媒體上得到的「大數據」，探討運動參與者如何使用網絡媒體進行不同類型的溝通，以至組織和協調行動 (Bennett, Segerberg, & Walker, 2014; Brym, Godbout, Hoffbauer, Menard, & Zhang, 2014; Penney & Dadas, 2013)。這些研究也可能會提出一些分類，但它們指向的不是個人層次的使用問題，而是一場運動中的網絡傳播的整體動態。

2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用 2012 年成功逼使香港特區政府讓步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來做對比。反國民教育運動的成功，除了它能取得大量市民支持外，也是因為國民教育是否要被列為中小學的必修科目這問題，縱使中央官員也許有強烈看法，在制度上始終是特區的內部事務。而且特區政府要推行國民教育，也要本地學校願意合作。在這意義上，反國教運動中的其中一個轉捩點，是一些社會上的主要辦學團體，尤其是香港天主教教區，公開聲明拒絕在其管理的學校中把國民教育立即變成必修課。換句話說，當一項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要依賴一些本地社會組織和人士的支持和合作時，一場運動如何能夠撼動這些本地社會組織和人士，就有更大機會取得成果。不過，政治改革問題並不涉及這種結構和狀況。

整體而言，每一場運動都可能有其在地的特徵，例如西方社會中，社運參與者可能多用 Twitter 來進行溝通 (Penney & Dadas, 2013; Tremayne, 2014)，香港市民則可能多用 Facebook 或 Whatsapp 等手機程式。不同類型的網絡傳播行為在不同的運動中的顯著程度也可能不一樣。所以本研究在分析網絡傳播行為時，採用的是由下而上，從具體現象出發的方式（這涉及問卷設計問題，將在方法部分再作討論）。所以問題一亦較具探索性質：

問題一：兩傘運動中的參與者通過網絡媒體進行那些跟運動有關的傳播行為？不同的網絡媒體傳播行為可否被分為不同的類型或範疇？

研究假設方面，本文首先關注網絡媒體活動和現場參與程度——即參與者在占領現場投入多少時間和精力——之間的關係。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並非必然。如不少論者就曾批評網上表達和行動可能只是一種懶動主義 (slacktivism)，跟線下的實際行動可能脫節 (Gladwell, 2010)。不過，從網絡社會運動和連結型行動的概念出發，網絡傳播和線下的實際行動是密不可分的。很多網絡傳播正是為了協調和組織線下行動而進行。不少經驗研究亦指出，網絡傳播本身也可以具有動員的效果，因為網絡媒體是資訊來源，也是動員訊息傳播的渠道，而且網絡媒體讓一般市民可以表達意見，而表達行為會讓人對相關議題作更深入的思考 (Tang & Lee, 2013; Tufekci & Wilson, 2012; Valenzuela, 2013; Valenzuela, Arriagada, & Scherman, 2014)。不過，一般有關網絡媒體和社會運動參與的研究，都是集中分析社交媒體或其他網絡媒體使用會否讓公民更多參與集體行動，亦即是說，該些研究中的依變項是人們多不多參與抗議和集體行動。但本研究分析的是在同一場運動的參與者之中參與程度的差異。事實上，在兩傘運動或占領華爾街這類長時間占領運動中，不同參與者的現場「參與」程度可以很不一樣，一些參與者可以每天都在占領區，但另一些參與者則可能只是偶而到占領區支持 (Milkman, Luce, & Lewis, 2013)。如果網絡傳播和線下實際行動密切相關，我們可以預期網絡傳播行為會促使參與者有更高的現場參與程度。這是本文的研究假設一：

假設一：在網絡媒體上越活躍的參與者，在占領現場的參與程度越高。

不過，網絡媒體對社會運動在有所助益之餘也可能帶來挑戰。當參與者在現場的投入程度越高，付出的努力越大，他們可能會對個人的自主性以及運動的

目標有更大堅持，所以他們可能在占領者應否在政府願意作出局部讓步時撤離占領區這問題上更不願意退讓，同時亦更不願意在重大策略問題上聽從主要組織者的意見。雖然現有的文獻沒有直接測試過這些關係，但這些預期跟文章之前提及的，網絡社會運動的非中心化傾向密切相關。

不過，筆者並不假設新媒體使用會直接使參與者更不願意聽從主要組織者的意見，因為人們可以使用新媒體進行不同類型的溝通，支持運動中心組織的參與者，也可能需要通過網絡媒體來得知中心組織者的決策和動態。新媒體的非中心化效應，主要是通過加強參與者的現場參與程度和對自主性的堅持而出現。當現場參與程度在統計上被控制之後，新媒體使用和撤退意願及對主要組織者的態度之間有甚麼樣的關係，是一個開放的研究問題。總括起來，研究假設二、假設三，以及問題二如下：

假設二：現場參與程度越高的運動參與者，越不願意因政府的局步讓步而撤退。

假設三：現場參與程度越高的運動參與者，越不願意在運動策略問題上聽從主要組織者或其他人士及組織的意見。

問題二：在統計上控制現場參與程度之後，網絡媒體使用和撤退意欲之間有沒有顯著關係？同樣，在控制現場參與程度之後，網絡媒體使用和對主要組織者的態度有沒有顯著關係？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不是要驗證一個已經被建立的，有關網絡傳播在連結型行動中的影響的理論模型。所以，在研究問題和假設中出現的，如現場參與程度和因政府的局步讓步而撤退等，並非理論概念，而是針對雨傘運動的實際狀況而提出的變項。而我們從分析中可見到的，是網絡媒體傳播跟雨傘運動中一些具體的動態有甚麼關係，從而瞭解網絡媒體對網絡社會運動可能產生的影響。

## 伍、研究方法

以下分析的數據來自由筆者及其研究團隊在 2014 年 11 月 2 日下午進行的雨傘運動現場調查研究。調查選擇在星期日下午進行，是因為該時段裡占領區內的人數會較多，這一方面有實際資源運用上的好處，因為占領區人數較多的話，同樣的人手安排可以在同樣的時段內訪問到更多被訪者。另一方面，選擇星期日下午亦能幫助調查研究包括更多只會在空閒時間到占領區參與支持的香港市民。

Mercea (2014) 以隨意參與者 (casual participants) 來形容在大型社會運動中參與程度不高的參與者。雖然這些參與者不是運動的中堅分子，但大型運動之所以出現，正是因為它們能吸引到大量隨意參與者加入，所以隨意參與者亦值得被調查研究包括在內。

由於資源和人手所限，調查只在旺角和金鐘占領區進行。兩個占領區的抽樣原則一樣。擔任研究員的學生助手被安排為兩人一組，他們被指定根據特定路線圍繞著占領區行走，在過程中邀請身邊經過的每第十人為被訪者，研究者要求研究員嚴格遵從抽樣方式行動，不可自行選擇被訪者，若經過第十人時發現一群人聚在一起，研究員必須邀請與自身距離最近的一位人士參與研究。被訪者自行填寫問卷，再由研究員收回。由於旺角占領區的地理位置關係，占領區內可能會出現較多路過的市民，所以旺角的研究員會在邀請一位市民參與調查時先詢問該市民是否到占領區參與支持運動。

以上的抽樣方法基本上是以占領區內參與者的時間和空間分布作為抽樣框架，研究者對研究員作出的指示則旨在把來自研究員主觀判斷和決定的偏差減至最低。類似的抽樣方式在香港及其他地方的研究均曾被使用 (Lee & Chan, 2011; Milkman et al., 2013; Walgrave & Verhulst, 2011)。研究團隊在旺角共成功訪問 296 人，在金鐘則成功訪問 273 人，樣本總人數為 569 人。兩個占領區的回應率均有 95%<sup>3</sup>。

在人口特徵上，金鐘的被訪者有 51.5% 為女性，而旺角的女性受訪者比例則只有 30.2%。年齡方面，25 歲或以下人士占金鐘參與者的 44.7%，26 至 40 歲的人士則占 39.7%。41 歲或以上的被訪者只占樣本的 15.7%。在旺角，三者的百分比分別為 51.5%、35.9%，以及 13.1%。換句話說，旺角被訪者的年齡比金鐘被訪者稍為年輕一點，但兩組被訪者的年齡分布之間的差異並未達致統計學上的顯著水平。

旺角占領區的樣本有更多具專上學歷的人士：66.3% 的旺角被訪者具備專上學歷，3.1% 只有小學學歷或從未接受教育。金鐘占領區的被訪者中，55.8% 具專上學歷，12.6% 只有小學學歷或從未接受教育。兩個占領區被訪者的教育程度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旺角占領區的參與者中亦有較多現役大學生——兩個占領區中的比例分別為 28.0% 和 20.5%。在社會階層方面，問卷要求被訪者自行判定

3 兩個占領區均有很高的回應率，一方面是因為調查進行當天占領區內氣氛平和有序，不太緊張，同時亦可能是因為占領運動參與者大都希望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因此亦願意參與學術性調查研究。

自己屬於那一個階層<sup>4</sup>。在本身也是一個草根階層居住地帶的旺角，50.8%的被訪者自認屬草根或低下階層，38.5%則自認屬中產階層。而在本身是一個金融和商業區的金鐘，則只有40.4%的被訪者自認屬草根或低下階層，同時有58.0%的被訪者自認屬中產階層。換句話說，旺角占領區的被訪者有較多男性，較多自認屬草根階層，較多具大專學歷的人士，及較多現役大學生。但整體而言，兩個占領區的參與者人口特徵差異其實不大。雨傘運動的參與者大部分是年輕人和擁有高學歷，現役大學生占參與者約四分之一，而自認屬草根階層及自認屬中產階層的則約各一半。

在問卷設計方面，首先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是對一場在形態和規模上都難以預期的占領運動所作的即時回應，研究者主要希望瞭解的是具體於眼前出現的運動動態。同時，正如在概念分析部分已提及，現時相關文獻中並沒有統一的網絡媒體使用量表，因為每個運動的在地特徵和情況不盡相同，所以本調查所包含的21條有關網絡媒體使用的題目，是根據筆者及其研究團隊對雨傘運動頭一個月的狀況的觀察而設定的。同樣道理，現場參與程度和撤退意欲等是指向雨傘運動中出現的具體狀況的變項，問卷中的題目也是研究團隊按雨傘運動的實際狀況而發展出來的。具體操作化將在以下部分跟分析結果一併討論。

## 陸、分析和發現

### 一、雨傘運動參與者的網絡媒體使用和行為

調查問卷包含一系列跟參與者網絡媒體使用和行為相關的問題，可用以回應研究問題一。表1總結該系列問題所得數據。問題關注的不是一般的新媒體使用，而是參與者有沒有在雨傘運動開始後試過在互聯網、社交媒體或手機群組中進行一些跟雨傘運動有關的活動，其中一些條目也可以被視為對運動的參與行動，而且這些行動對運動的發展有一定的重要性。例如從運動一開始，網絡上就流傳不少跟運動有關的謠言，包括解放軍軍車已經出動、旺角占領區有女學生被人非禮等。如表1所示，只有5%的被訪者沒有試過通過新媒體接觸到關於運動的謠言，而有55.0%的被訪者經常接觸到關於運動的謠言。面對著謠言的攻擊，很多運動參與者自行在網絡上進行闢謠工作。在臉書上便出現「謠言終結者」<sup>5</sup>

4 由於調查在公眾場所進行，被訪者很可能不願意回答較私人的問題，故此問卷不詢問被訪者的收入，而只要求被訪者自行判斷自己所屬階級。

5 謠言終結者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pages/謠言終結者-和平佔領運動資訊>

	沒有	有，但不經常	經常
自占領運動開始後，你有沒有試過在互聯網，社交媒體或手機群組中：			
接觸到有關占領運動的謠言	5.0	40.0	55.0
嘗試澄清謠言	19.2	49.0	31.8
接觸到自己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	10.7	47.4	41.9
接觸到自己不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	14.0	45.2	40.8
回應自己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	22.5	47.9	29.6
回應自己不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	47.3	38.6	14.2
更改 profile picture 來表達對運動的支持	29.5	14.4	56.1
發放自己在現場拍下的照片或影片	21.9	37.2	40.9
發放自己製作的圖片，改圖等	73.0	15.8	11.2
就運動的某些方面發表評論文章	45.2	37.1	17.7
就運動發表簡短的個人感受	19.1	49.7	31.2
轉發大眾媒體的相關新聞或評論	15.8	38.2	46.0
轉發網絡上對運動的評論	19.8	39.9	40.3
轉發朋友拍攝的照片，影片或改圖	28.3	41.2	30.4
轉發朋友就運動而寫的文章	35.5	38.8	25.7
向外國的朋友解釋運動和香港的狀況	42.6	40.1	17.2
向身在中國大陸的朋友解釋運動和香港的狀況	59.3	29.5	11.2
Unfriend 跟自己意見不一樣的人士	70.8	23.2	6.0
通過手機程式傳送有關運動的訊息	18.9	44.3	36.8
通過手機程式跟朋友討論占領運動	16.7	44.7	38.7
建立專門討論占領運動的手機討論群組	53.2	27.5	19.3

表 1：運動現場參與者的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和「佔中謠言追追追」<sup>6</sup>等專頁，對有關運動的傳言進行查證。表 1 亦顯示，八成以上的運動參與者有在互聯網上嘗試澄清謠言，超過三成被訪者更是經常協助澄清謠言。

運動參與者亦通過新媒體接觸不少反占中人士的言論，其中部分來自認識的朋友，部分來自不認識的人士。參與者較多回應自己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接近三成被訪者經常這樣做，而有這樣做的比例總共超過 85%。相比之下，有回應自己不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的被訪者只有 53% 左右，但這百分比也不算低。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是一個讓使用者進行表達的空間 (Macafee & de Simone,

/1486627231608268

6 佔中謠言追追追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OccupyCentralMythKiller>

2012)。有七成被訪者有在社交媒體上更改自己的 **profile picture** 來表達對運動的支持。四成被訪者經常發放自己在現場拍下的照片或影片，另外三成半以上的被訪者亦曾試過發放自己拍下的照片或影片。超過三成的被訪者經常通過網絡媒體發表簡短的個人感受，只有約兩成被訪者完全沒有發表簡短個人感受。可以理解的是較少人會發表較為長篇的評論文章或自己製作的改圖，但有在網絡媒體上發表過評論文章的也有超過一半的被訪者，而有試過發放自製圖片或改圖的則有約四分之一的被訪者。

正如不少傳播學者指出，真正會在網絡上進行內容生產的普通人其實比例不會太高 (van Dijck, 2009)，大部分人都是在網絡上擔當著內容發布者和推介者的角色。不過這發布者和推介者角色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因為它使得某些內容在網絡上廣泛流傳，而且內容對接收者的影響力可能會因為它來自朋友的推介而增加。表 1 顯示，46.0% 的被訪者經常轉發從大眾媒體而來的關於運動的新聞或評論，40.3% 的被訪者經常轉發網絡上對運動的評論，經常轉發朋友拍攝的照片、影片或改圖的也超過三成，另外約四分之一的被訪者經常轉發朋友就運動而寫的文章。

雨傘運動受到全球關注，但國外人士不一定瞭解運動的來龍去脈和香港的狀況。同時，由於大陸的新聞封鎖，身處中國大陸的人士較難得知有關運動的資訊。表 1 顯示，40.1% 的運動參與者有試過通過網絡媒體向外國的朋友解釋運動和香港的狀況，17.2% 的運動參與者更是經常這樣做。29.5% 的運動參與者則有試過向身在中國大陸的朋友解釋運動和香港的狀況，而 11.2% 的運動參與者經常這樣做。

運動發生後，香港社會上出現了因對占領運動意見不一而在社交媒體上把朋友「unfriend」的現象。現場調查結果發現，真的有在社交媒體上把朋友「unfriend」的運動參與者比例其實不高，只有不足三成有試過這樣做。最後，問卷亦包括了幾題跟手機程式使用直接相關的題目。超過三分之一的被訪者經常通過手機程式傳送有關運動的訊息，同時亦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被訪者經常通過手機程式跟朋友討論占領運動。另外，接近一半的運動參與者有建立專門討論占領運動的手機討論群組。

總括而言，表 1 顯示運動參與者在網絡媒體上有活躍的傳播和參與行為。為方便進一步分析以及回應研究問題一的後半部分，筆者對表 1 的題目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使用的是最大概似 (maximum likelihood) 分析和斜交轉軸法。表 2 顯示因子分析的結果。雖然 21 個題目並非來源自已被檢驗的量表，但大部分題



	因子一： 網絡表達	因子二： 手機溝通	因子三： 網絡辯論	因子四： 網絡闡釋
接觸到有關占領運動的謠言			0.35	
嘗試澄清謠言			0.33	
接觸到自己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			0.68	
接觸到自己不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			0.63	
回應自己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			0.70	
回應自己不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			0.48	
更改 profile picture 來表達對運動的支持				
發放自己在現場拍下的照片或影片				0.56
發放自己製作的圖片，改圖等				0.45
就運動的某些方面發表評論文章	0.30			
就運動發表簡短的個人感受	0.41			
轉發大眾媒體的相關新聞或評論	0.89			
轉發網絡上對運動的評論	0.93			
轉發朋友拍攝的照片，影片或改圖	0.52			
轉發朋友就運動而寫的文章	0.52			
向外國的朋友解釋運動和香港的狀況				0.52
向身在中國大陸的朋友解釋運動和香港的狀況				0.52
Unfriend 跟自己意見不一樣的人士				
通過手機程式傳送有關運動的訊息		0.73		
通過手機程式跟朋友討論占領運動		1.00		
建立專門討論占領運動的手機討論群組		0.56		
特徵值 (eigenvalue)	6.84	1.83	1.43	1.24

表 2：運動期間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的因子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因子分析以斜交轉軸法進行。表中數值為型樣矩陣中的因子負荷量。為清晰起見，小於 0.30 的因子負荷量被隱藏。

目都頗為清晰地分別屬於 4 個因子<sup>7</sup>。只有 3 個題目在 4 個因子上都沒有高於 0.30 的負載值，分別是「更改 profile picture 來表達對運動的支持」、「發放自己在現場拍下的照片或影片」，和「unfriend 跟自己意見不一樣的人士」。另外，「就運動的某些方面發表評論文章」則在兩個因子上有高於 0.30 的負載值。

在因子一上有最高因子負載值的是「轉發大眾媒體的相關新聞或評論」以及

7 除了以特徵值高於 1.0 作為確認因子存在的標準外，作者亦在分析時參照了陡坡圖。陡坡圖顯示，在頭四個因子之後，由第五個因子開始，每個因子的解釋變異數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條直線。所以因子數量為 4 是一個對分析結果的合理詮釋。

「轉發網絡上對運動的評論」。另外，轉發朋友拍攝的照片或所寫的文章、發表簡短個人感受，和發表評論文章都屬於因子一。因此因子一可以被稱為網絡表達行為，它包括的主要的是一些通過網絡媒所進行的內容分享和單向個人表達。

因子二由三個跟手機群組使用直接相關的題目組成，所以可以簡單地被稱為手機溝通行為，意指運動參與者利用手機的各種網絡功能來跟別人進行關於運動的溝通。

共有 6 條題目在因子三上有高於 0.30 的負載值。其中有較高負載值的是幾個接觸或回應反占中人士言論的題目。同時，關於運動的謠言也多帶有反對運動的意味。所以，因子三涉及的是參與者對反對運動的聲音有多少接觸和回應。由於因子三同時擁有關於「接觸」和「回應」的題目，所以筆者將因子三稱為網絡辯論行為，它指向的是運動參與者有沒有在網絡上跟異議者進行溝通。

4 條題目在因子四上有高於 0.40 的負載值，包括「向外國的朋友解釋運動和香港的狀況」、「向身在中國大陸的朋友解釋運動和香港的狀況」、「發放自己製作的圖片或改圖」，以及「就運動的某方面發表評論文章」。筆者將這因子稱為網絡闡釋行為，因為四個題目中有三條都涉及被訪者向他人解釋或評論運動的狀況，而發放改圖也屬於這個因子，正可能代表著發放改圖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對運動作出某種闡釋。

根據因子分析的結果，筆者建構了網絡表達、網絡辯論、網絡闡釋，和手機溝通 4 個指標，但只有當一個題目在一個因子上的負載值超過 0.40，它才會被納入到指標中，所以接觸或澄清謠言沒有被納入網絡辯論指標中。每位被訪者在指標上的數值就是被訪者在屬於該因子的題目上的回答的平均值（網絡表達：M. = 1.11, S.D. = 0.61,  $\alpha = .88$ ；網絡辯論：M. = 1.08, S.D. = 0.51,  $\alpha = .72$ ；網絡闡釋：M. = 0.60, S.D. = 0.51,  $\alpha = .67$ ；手機溝通：M. = 1.02, S.D. = 0.62,  $\alpha = .79$ ）。四個指標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相關性最低的是網絡辯論和網絡闡釋 (Pearson  $r = 0.33$ ,  $p < .001$ )，相關性最高的則是網絡闡釋和網絡表達 (Pearson  $r = 0.56$ ,  $p < .001$ )。由於 4 個指標之間的相關程度並不低，若將 4 個指標同時放進一多變項分析之中，可能會引起多元共線性 (multicollinearity) 的問題，所以筆者取 4 個指標的平均值來代表整體網絡傳播和參與行為 (M. = 0.95, S.D. = 0.42,  $\alpha = .74$ )，以方便在有需要時作更簡化的分析。

表 3 顯示了運動參與者的人口特徵及其網絡傳播和參與行為的關係。在多變項迴歸分析中，教育程度跟四個指標都沒有顯著關係，旺角和金鐘占領區的被訪者在網絡傳播和參與上也是同樣地活躍。性別則只跟網絡辯論有僅僅在統計上達

	網絡表達	網絡辯論	網絡闡釋	手機溝通
性別 (2 = 女性)	-.03	-.06	-.09*	-.01
年齡	-.14***	-.18***	-.13**	-.25***
教育程度	-.01	-.01	-.04	-.02
社會階層	.05	-.02	.14**	.05
占領點 (2 = 旺角)	-.02	.04	-.00	-.07
調整後的 R <sup>2</sup> 值	.015***	.028***	.032***	.057***

表 3：人口特徵對四種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的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數字為標準化迴歸係數。變項中的缺失值由變項的平均值取代。有效樣本數為 569。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顯著程度的關係。年齡是唯一跟 4 個依變項都有顯著相關的人口變項。年輕的參與者較年長的參與者在各種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上更加活躍。有趣的是，社會階層對網絡表達、網絡辯論，和手機溝通都沒有影響，但社會階層卻跟網絡闡釋行為有頗顯著的正面關係。自認屬上層或中產階級的運動參與者，較自認為屬草根階層的運動參與者更多參與網絡闡釋行為。這大概是因為網絡闡釋行為包括了向身處香港以外的朋友解釋香港的狀況，而上層或中產階級應該較草根階層更可能在香港以外有認識的朋友或親戚，所以他們亦更有可能參與到網絡闡釋行為當中。

## 二、網絡傳播與參與、現場參與程度，和對撤退的態度

研究假設一至三提出了一些變項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我們可用迴歸分析來檢測這些假設。檢測假設一的迴歸分析以參與者的現場參與程度作為依變項。現場參與程度以三個變項為測量，分別是被訪者到過占領區多少天（答案由 1 = 1 天至 6 = 每天都在占領區參與）、每次到占領區逗留的時間平均為多少（以小時計算），以及被訪者有沒有試過通宵留守在占領區內（答案為有或沒有）。為簡化分析，筆者將三個題目合併成一個指標，由於三個题目的量表不一樣，合併方法是先將三個题目的答案標準化，然後再取其平均值 ( $M = 0.05, S.D. = 0.73, \alpha = .67$ )。

迴歸分析的自變項分別為人口特徵、占領區地點，以及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表 4 的第一欄顯示，女性比男性參與者的現場參與程度稍低一點。同時，教育程度越高，在占領區現場花的時間也較少。年齡和社會階層則和現場參與程度沒有統計學上顯著的關係。在控制掉人口變項之後，旺角占領區的參與者較金鐘占領區的參與者的現場參與程度稍高。

當四個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同時被加到迴歸分析時，只有手機溝通和網絡

	依變量：現場參與程度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性別 (2 = 女性)	-.08*	-.09*	-.09*	-.08	-.09*	-.08*
年齡	-.05	-.10*	-.10*	-.10*	-.06	-.06
教育程度	-.14***	-.15***	-.15***	.15***	-.15***	-.15***
社會階層	-.07	-.06	-.05	-.07	-.06	-.07
占領點 (2 = 旺角)	.09*	.08	.07	.07	.09*	.08
網絡表達	.03	.19***				
網絡辯論	-.02		.10*			
網絡闡釋	.11*			.19***		
手機溝通	.21***				.26***	
網絡參與和傳播 (總體)						.25***
調整後的 R <sup>2</sup> 值	.110***	.074***	.050***	.075***	.102***	.100***

表 4：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與現場參與程度的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數字為標準化迴歸係數。變項中的缺失值由變項的平均值取代。有效樣本數為 569。

\* $p < .05$ ; \*\*\* $p < .001$ 

闡釋跟現場參與程度有正面和統計學上顯著的關係，其中手機溝通的迴歸系統明顯較大，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亦更高。不過，如上一節提及，由於四個網絡傳播和參與行為指標之間有頗高度的相關性，當被放進同一個迴歸分析模型時，指標之間的多元共線性可能會影響個別指標的表現。所以，表 4 亦展示另外五個迴歸分析模型。模型二至模型五分別只用上了四個網絡傳播和參與行為指標的其中之一為自變項。結果顯示，當單獨成為自變項時，四個網絡傳播和參與行為指標都與現場參與程度有顯著的正相關。而模型六則用上了整體網絡傳播和參與行為（即四個指標的平均值）作為自變項，而這整體行為指標亦跟現場參與程度有顯著的相關。總括來說，表 4 的發現支持了研究假設一，而在四項網絡行為中，手機溝通的影響尤其顯著。

這裡需要先指出，調查是在單日進行的一個橫切面調查研究，並不能引證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明顯地，除了網絡媒體使用可能會加強參與者的現場參與程度之外，現場參與程度較高的參與者很可能會傾向更多使用網絡媒體。筆者會在結論部分再討論因果關係的問題。

餘下的研究假設會涉及運動參與者在 11 月初時對撤退的態度，以及他們是否願意在運動策略問題上考慮運動組織者的意見。表 5 先綜合相關問卷题目的描述性數據。問卷詢問被訪者是否願意在某些假設情況下撤退。問題是根據運動當時的實際狀況以及社會上的各種輿論而設計的。具體地說，在調查研究進行時，

	絕對不會／ 應該不會	應該會／ 肯定會	平均值
就個人而言，若以下情況出現，你會否撤離？			
特區政府不再有新回應，只承諾建設多方平臺和向港澳辦提交民情報告	72.0%	6.5%	1.78
特區政府再有新回應，同意向人大提交補充報告	48.0%	17.4%	2.46
特區政府再有新回應，承諾立法會在十年內循序漸進至完全取消功能組別	32.7%	32.4%	2.90
特區政府有新回應，承諾在提名委員會組成上取消公司票	31.2%	30.1%	2.88
	非常不願意／ 不願意	非常願意／ 願意	平均值
就個人而言，有關運動的發展和策略問題，除了你自己的意見外，你會有多願意聽取以下人士或組織的意見？			
學聯	8.8%	64.4%	3.82
學民思潮	8.2%	60.3%	3.74
占中三子／和平占中	35.2%	32.5%	2.89
自己支持的政黨或組織	19.6%	31.3%	3.15
大學校長	28.8%	23.6%	2.87
自己的朋友	11.3%	42.0%	3.36
家人	25.4%	26.0%	2.96
民意調查所反映的民意	16.7%	42.6%	3.35
報章社評	25.6%	29.9%	3.00
占中支持者發表的網絡評論	10.0%	48.3%	3.48
反占中者發表的網絡評論	47.6%	16.4%	2.42

表 5：參與者對撤退的態度以及是否願意考慮組織者的意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學聯和政府官員已經進行過公開對話，在對話中，政府官員承諾會向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提交民情報告，以及在未來建設多方平臺討論政改。運動支持者對政府的提案大都感到不滿意，認為根本不算有實質讓步。而調查數據亦指出，在一個 5 分量表（1 = 絕對不會，5 = 肯定會）上，超過七成的運動參與者表示絕對不會或應該不會就此撤退。

不過，運動參與者並非沒有妥協的準備和空間。如果特區政府同意向全國人大提交補充報告，進一步闡釋香港的實際情況和表達港人對真普選的訴求，絕對不會或應該不會撤退的被訪者比例會降至 48.0%，而肯定會或應該會撤退的被訪者比例則有 17.4%。如果政府承諾立法會於十年內循序漸進至完全取消功能組別議席的話，絕對不會或應該不會撤退的被訪者比例會再降至 32.7%，而肯定會或

應該會撤退的被訪者比例則會上升至 32.4%<sup>8</sup>。另外，若特區政府承諾在持首選舉提名委員會產生辦法上取消公司票制度，絕對不會或應該不會撤退的被訪者比例為 31.2%，而肯定會或應該會撤退的被訪者比例則有 30.1%<sup>9</sup>。總的來說，不少運動參與者都會願意在局部成果出現時先行撤退。當然，亦有為數不少的參與者堅持不會因政府的局部退讓而撤離。

運動參與者到最後願意撤離與否，一方面是個人決定，但另一方面亦可能會受到不同組織和人士的意見的左右。不過，不是每個參與者都願意在運動的發展和策略問題上聽取其他組織和群體的意見。表 5 的下半部分展示相關問卷題目所得的數據。需要指出的是，問卷題目用上了「聽取」而非「聽從」一詞，因為可能極少參與者會指自己願意「聽從」組織者。「聽取」較接近「考慮」的意思。但表 5 亦顯示，接近 10% 的運動參與者連「聽取」兩個主要學生組織的意見都不願意。當然，也有接近三分之二的被訪者表示願意在運動發展和策略上聽取兩個主要學生組織的意見。

相比學生組織，占中三子較不受運動參與者支持，超過三分之一的被訪者表示不願意聽取占中三子在運動發展和策略上的意見，比願意聽取占中三子意見的比例還要高出一點。

在三個主要組織之外，較多參與者願意聽取的有自己的朋友的意見，占中支持者發表的網絡評論的意見，以及民意調查所反映的民意。願意聽取自己支持的政黨或組織的意見的被訪者不足三分之一。我們可以說，表 5 的下半部分也間接展示運動參與者對自發動員的強調。除了兩個學生組織之外，參與者其實並不太願意考慮其他組織和團體的意見，他們較願意聆聽的是沒有組織背景的群體，如自己的朋友和網民等。

為方便檢測研究二至四，我們把表 5 列出的題目合併為三個指標。第一個指標是四題關於被訪者願不願意撤退的題目的平均值 ( $M. = 2.51, S.D. = 0.92, \alpha = .80$ )。第二個指標是被訪者願不願意聽取三個運動主要組織者的意見的平均值 ( $M. = 3.41, S.D. = 0.89, \alpha = .82$ )。第三個指標則是被訪者願不願意聽取其他組織、人物，或群體的意見的平均值 ( $M. = 3.07, S.D. = 0.74, \alpha = .83$ )。

表 6 總括為檢測研究假設二和三而進行的迴歸分析的主要結果。從第一欄

8 2017 年特首選舉安排跟立法會的改革相連。在現制度下，如果 2017 年特首選舉改革方案不獲通過，立法會選舉方法的改動也不會開始。所以，對支持民主的香港市民而言，其中一個接納不完美特首普選方案的原因，就是為了啟動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改革。

9 在現制度中，特首選舉提名委員會內不少界別的代表是由公司或機構作為單位選出的，公司票制度幫助中國中央政府控制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若提名委員會的產生辦法中取消了公司票制度，中央政府將較難控制提名委員會，而提名委員會亦應該更能反映民意。

可見，在多變項分析中，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對參與者的撤退意願均沒有顯著影響，但社會階層較高的參與者的撤退意願較高，這可能是因為社會階層較高者，若持續參與運動，會有較高的機會成本。另外，相比金鐘的參與者，旺角的參與者較不願意因政府作出局部讓步而撤退。更重要的是分析結果支持研究假設二：參與者的現場參與程度越高，撤退意願就越低。

統計分析中，在控制現場參與程度後，四個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指標中，有兩個與撤退意願有顯著關係。有趣的是，兩個關係的方向是相反的。越多進行網絡表達的參與者，撤退意願越低，但越多進行網絡闡釋行為的參與者撤退意願則越高。前者可能顯示網絡表達行為除了可以令參與者花更多時間投入到現場的占領運動中，也可能直接令參與者的態度更堅定和不願在目標上妥協。至於網絡闡釋行為越多的參與者撤退意願越高，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網絡闡釋行為主要涉及與香港以外的人士溝通，這些國內或海外人士不一定支持運動，而且可能從旁觀者的角度為參與者提供不同的觀點，從而令參與者較願意考慮妥協的可能性。

表 6 的第二欄展示跟研究假設三相關的分析結果。女性和年齡較大的參與者比較願意在運動策略問題上聽取主要組織者的意見，而旺角占領區的參與者則較不願意聽取主要組織者的意見。如假設三所預期，現場參與程度越高的參與者，越不願意在運動的發展和策略問題上聽取主要組織者的意見。

	願意在政府局步讓步 情況下撤退	願意在策略問題上聽 取主要組織者的意見	願意在策略問題上聽取 不同人士和組織的意見
性別 (2 = 女性)	.01	.11**	.09*
年齡	-.05	.23***	-.12**
教育程度	.02	-.02	-.04
社會階層	.08*	.01	.02
占領區 (2 = 旺角)	-.16***	-.15***	-.07
網絡表達	-.13*	.01	-.08
網絡辯論	.00	.01	-.01
網絡闡釋	.13*	.06	.14**
手機溝通	-.04	.04	.17**
現場參與程度	-.17***	-.13**	-.19***
調整後的 R <sup>2</sup> 值	.070***	.100***	.088***

表 6：參與者撤退態度以及是否願意考慮組織者意見的迴歸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數字為標準化迴歸系數。變項中的缺失值由變項的平均值取代。有效樣本數為 569。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在統計分析中控制現場參與程度之後，四個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指標對依變項都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影響。若我們用整體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來取代四個個別指標，然後再次進行迴歸分析，整體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跟依變項會有顯著的正相關。換句話說，整體網絡傳播越活躍的參與者，在撇除現場參與程度的影響後會較願意聽取主要組織者的意見，但其相關性較弱，迴歸系數亦只是僅達致統計學上的顯著水平而已 ( $\beta = .09, p = .042$ )。

表 6 第三欄顯示有甚麼因素會跟參與者是否願意在運動發展和策略問題上聽取其他人和組織的意見相關。跟第二欄結果相同的是女性被訪者較願意聽取其他人或組織的意見，有趣的是，年輕人雖然較不願意聽取運動組織者的意見，他們卻比年長者更願意聽取其他人和組織的意見。兩個占領區的參與者在願意聽取其他人和組織意見與否上沒有顯著的差異。

現場參與程度再次和依變項有顯著的負相關：花了越多時間投身占領運動現場的人，越不願意在策略問題上聽取他人或其他組織的意見。在現場參與程度被控制掉之後，四個網絡參與和傳播指標中，有兩個跟依變項有顯著的正相關，它們分別是網絡闡釋行為以及手機溝通。如上所述，多進行網絡闡釋的參與者可能從身處國內或海外的人士中得到一些值得思考的觀察和意見。至於手機群組本身主要就是使用者跟自己的朋友溝通的渠道，多用手機群組溝通的人，對朋友以至其他人的意見也可能會較為重視。

在對研究結果進行整體討論前，有一點需先作說明，表 3、表 4，和表 6 的迴歸分析結果的  $R^2$  值都較低。這表示一些會影響各依變項的重要因素並未被包括在迴歸模型之內。但本文的旨趣不在於為這些依變項提供完整的理論模型，而是在於通過檢視網絡媒體傳播行為跟一些依變項之間的關係，嘗試瞭解網絡媒體傳播和兩傘運動的動態發展的關聯。事實上，影響現場參與和撤退意欲的可能因素眾多，我們沒有強力的理由預期傳播行為對這些依變項可以有壓倒性的影響。將這點考慮在內的話，從結果來看，網絡媒體傳播的解釋力並不算弱。如表 4 顯示，網絡媒體傳播和現場參與程度之間的關係是高度顯著的。在模型六中，整體網絡媒體傳播的標準化迴歸系數為 0.24，其相應的  $t$ -value 達 5.74。它亦是迴歸模型中解釋力最強的自變項，如教育程度的影響力也是高度顯著的，但與其迴歸系數相應的  $t$ -value 也只是 3.64。另外，在表 6 的第一欄，現場參與程度對撤退意欲的影響也頗為顯著，與其迴歸系數相應的  $t$ -value 為 3.90，也是整個模型中最高的。



## 柒、討論和總結

本文旨在探討並存於雨傘運動之中的不同類型行動邏輯之間的矛盾和張力，並分析新媒體在其中的位置和影響。分析的起點，是雨傘運動原本是一個有中心組織的運動，而且由於有具體的政策要求，它需要跟運動的訴求對象——即香港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進行策略互動。在這些方面，雨傘運動算是一個傳統的集體行動。但同時，不少雨傘運動參與者對運動亦有高度個人化或小組化的參與。通過人際網絡和網絡媒體的傳播和溝通，原本只屬「一般參與者」的個人可以跟認識甚至不認識的其他參與者連繫起來，自行設計及進行活動。所以，雨傘運動亦有網絡社會運動 (Castells, 2012) 和連結型行動的特徵 (Bennett & Segerberg, 2013)。連結型行動非常依賴由網絡媒體構成的傳播基建。而數據分析就顯示，雨傘運動的參與者的確在網絡上非常活躍。這並不只是指他們常常使用互聯網或社交媒體，而是指他們通過網絡媒體頻繁地進行直接跟運動有關的傳播和行動。

相比起傳統的大型集體行動，連結型行動的力量在於它給予每位參與者更大的自由和發揮空間。參與者在參與形式和行為上有各種機會和選擇，這不但有助吸引更多市民參與到運動當中，在參與者之中，連結型行動的出現亦可以加強參與者對整個運動的投入程度。以上的數據分析正指出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的確跟現場參與程度有正面的關係。

之前已經指出，調查是一次性的橫切面研究，並不能證明兩個相關變項中那個是因，那個是果。一個對現場占領行動非常投入的參與者，當然亦很可能會參與更多網絡媒體上的傳播和行動。不過，在一場運動的動態發展中，不同變項之間的關係最有可能是互為因果的，亦即是說，對現場占領行動參與程度高的人會更積極進行網絡傳播，而積極的網絡傳播行為則會加強或至少協助保持人們對現場占領行動的參與，正如一些傳播學者指出，態度和行為強化 (reinforcement) 也是一種不可忽略的傳播效應 (Holbert, Garrett, & Gleason, 2010)。再者，無論因果關係的方向為何，網絡和社交媒體讓對現場參與程度最高的參與者有自我表達和跟別人溝通的空間，這本身就對運動的延續和發展起著一定的作用。同時，回應現時文獻中的一些討論，本研究的結果也代表跟雨傘運動相關的網絡傳播行動並不只是一種懶動主義 (Gladwell, 2010)。網絡傳播行為及線下的實際行動是相輔相成的。雖然本研究只分析參與者，數據沒有顯示網絡媒體使用會否令一般市民更可能成為參與者，但正如文章的概念部分指出，在一個長時間的占領運動中，不同參與者的現場參與程度可以有很大的差異。本文的分析正顯示，參與者不會

因為多了進行網絡傳播行動，就減少到現場的參與。相反，當參與者多進行網絡傳播行動時，他們會花更多時間在現場參與和支持占領。

不過，本文的另一重點，是連結型行動邏輯和傳統集體行動邏輯之間的差異，可能使運動內部產生張力和衝突。在雨傘運動中，連結型行動帶來非中心化的力量，使得參與者與主要組織者之間的關係變得較為疏離。數據分析就顯示，現場參與程度越高的參與者，在應否撤退的問題上顯得更不願意退讓。當然，不願意在撤退問題上退讓本身並不一定是一個問題。較為重要的問題，是現場參與程度越高的參與者越不願意在運動策略問題上聽取主要組織者的意見。這很可能是連結型行動和網絡社會運動的一個特點。在傳統的運動中，投入程度最高的參與者，通常都是跟中心組織關係最密切的參與者 (Passy, 2003; Passy & Giugni, 2000)，他們應該不會更不願意在重要問題上聽取主要組織者的意見。但在連結型行動中，現場參與並不建基於參與者與中心組織的關係。在這情況下，現場參與程度越高的參與者，越可能覺得自己是一個獨立的主體，所以在運動策略問題上比較不重視主要組織者的意見。事實上，數據分析顯示，他們亦較不重視其他人士和組織的意見。

正如在分析中提到，問卷的相關問題只用上「聽取」一詞，在字義上沒有言聽計從的意思。把這點考慮在內，只有三分之二的參與者願意聽取學聯或學民思潮的意見，比例算是頗小的，而只有約三分之一的參與者願意聽取占中三子的意見，更顯示不少參與者對占領行動原發起人的不滿。運動組織者缺乏高度和全面的支持，不支持中心組織的參與者又可以很容易地透過網絡媒體發聲。而且，正如剛剛提到，對現場占領行動投入程度最高，長期駐紮在占領區的參與者，偏偏又是最不願意聽從中心組織領導的參與者，這大大增加運動組織者作決定的難度。

具體地說，連結型行動邏輯帶來的非中心化力量，使得運動組織者難以跟政府談判和討價還價。在調查研究中，我們看到不少參與者其實願意在政府作出局部讓步時撤退，但在缺乏大部分參與者的全面支持下，運動組織者難以公開提出任何折衷方案，因為提出任何方案都可能惹來運動內部的批評甚至是背叛運動的指摘。

當然，特區政府由始到終都沒有作出調查問卷中提到的假設性讓步。也許，無論運動如何討價還價，特區政府都不會讓步。另外，從較激進或最強調非中心組織的運動參與者的角度看，跟政府談判和討價還價，也許正是他們要放棄的傳統社會行動邏輯。但不管個別行動邏輯在規範意義上的好與壞，連結型行動邏輯加大運動與政府之間討價還價的難度，應該是一個合符事實的陳述。

推而廣之，雨傘運動可以作為一個案例，顯示當連結型邏輯滲入到社會運動時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網絡社會運動要面對的一些挑戰。現時的理論和研究文獻大都對新社運模式作正面的分析和評價，強調其優點和力量。例如在談論非中心化的傾向時，現時的文獻多強調非中心化令更多人可參與運動的策劃和發展，又或令當權者更難打壓運動 (Boler, MacDonald, Nitsou, & Harris, 2014; Castells, 2012)，但對非中心化帶來的挑戰則沒有太多具體分析。本文則是依據經驗數據及觀察，指出非中心化的運動要面對的困難。

進一步說，本研究也指出當網絡社會運動和連結型行動要取得實際成果時可能會出現的困難。Castells (2012) 在討論占領華爾街行動的成果時，強調網絡社會運動不是要在短期內爭取具體的政策目標，而是要長遠地改變社會文化。但不是每一場占領運動都是最典型的網絡社會運動。香港的雨傘運動就是有具體政策目標的，所以「成敗」不能只看長遠的文化轉變（雖然文化轉變也是運動的可能影響和成果之一）。而當雨傘運動在中國及特區政府沒有具體讓步之下結束時，很多運動參與者都不能否定運動在爭取目標上的確是「失敗」了。當然，正如文章之前已經指出，影響一場運動成敗的因素有很多，例如香港是一個特區，而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民主化和普選問題有強烈的看法。在威權體制下，香港的地區社會運動力量本來就難以撼動國家層次的決策，雨傘運動沒能取得成效，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機會結構本身的問題。但本文分析亦顯示，由網絡傳播行為及連結型行動邏輯帶動的非中心化傾向，也可能是妨礙網絡社會運動爭取實際目標和效果的因素之一。這也是本文對現時文獻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網絡社會運動可以如何應對非中心化傾向帶來的挑戰？雖然這問題超出本文的範圍，而且可能根本沒有單一的應對方式是適用於每一個網絡社會運動的，但筆者也可以在這裡提出兩點想法。首先，非中心化會否帶來運動的碎裂，還是要看運動中人對主要組織者以至對其他參加者的信任程度有多高，而這就要看組織者以至社會整體本身有多少「社會資本」。在一個人們基本上互相信信的社群中，非中心化的組織型態未必會嚴重影響運動的決策效率，但在一個容易產生和傳播不信任的環境中，非中心化帶出的問題就可以較為嚴重。這也代表著社會運動要做的工作，包括如何在平常的時間與其支持者建立互信、累積社會資本。第二，非中心化的網絡社會運動始終是較新的現象，運動組織者和參與者也應該是處於一個學習如何應對的過程中。要有效地面對非中心化和自發動員所帶來的挑戰，組織者和參與者首先要在肯定這些趨勢和現象的優點的同時，不要將這些現象有過份正面或浪漫化的詮釋。

最後，筆者亦應指出本研究的一些限制。第一是以上已提及的因果關係問題，在此不贅。第二，由於研究在運動發生期間即時設計和進行，目的是對具體的運動動態作出紀錄和分析，所以問卷設計較多使用由在地觀察出發而得出的題目。這使研究結果跟其他國家的網絡社會運動的研究結果較難直接比較（不過這並不排除研究結果被歸納到概念層次時的普遍性意義）。第三，本文只分析幾個依變項，如現場參與程度、對撤退的想法等，但仍有頗多跟參與方式和政治態度相關的變項未有涉及（如參與占領區內一些主要活動的程度、有沒有嘗試動員朋友到占領區、對政府的評價、對運動模式的評價等）。這部分也會在筆者未來的其他分析文章中處理。第四，本文的分析集中在網絡媒體傳播跟現場參與程度以及對撤退的想法的關係，但並未對影響現場參與程度和對撤退的想法的因素有更系統和全面的分析，因而迴歸分析的  $R^2$  值亦較低。第五，量化分析可以幫助我們尋找到一些雨傘運動當中人們使用網絡媒體的模式，但個別參與者如何發揮能动性，利用網絡媒體來建構自己個人化的參與行為，則需要通過深入訪談作補充。

作為結論，我們可以指出，在網絡媒體時代，網絡社會運動和連結型行動邏輯可能會越來越頻繁地出現。但接近理想型的純連結型行動可能並不多，更常出現的是傳統集體行動和連結型行動的混合物。連結型行動對社會運動無可否認地有所助益，但對組織者來說，如何將集體行動邏輯和連結型行動邏輯磨合起來，使運動聲勢得以壯大之餘，同時保留著在有需要時帶領運動走向以及跟運動的訴求對象互動的能力，是一個社運組織者需要面對的挑戰，也是運動的支持者和參與者需要思考的問題。

## 參考書目

- Anduiza, E., Cristancho, C., & Sabucedo, J. M. (2014). Mobilization through online social networks: The political protest of the indignados in Spai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7*, 750-764.
- Atkinson, J. D. (2010). *Alternative media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Bagdikian, B. (2004). *The new media monopoly*. Boston, MA: Beacon.
- Bennett, W. L. (2008). Changing citizenship in the digital age. In W. L. Bennett (Ed.), *Civic life online: Learning how digital media can engage youth* (pp. 1-24).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2013).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1).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 770-799.
- Bennett, W. L., Segerberg, A., & Walker, S. (2014). Organization in the crowd: Peer production in large-scale networked protes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7*, 232-260.
- Boler, M., MacDonald, A., Nitsou, C., & Harris, A. (2014). Connective labor and social media: Women's roles in the "leaderless" Occupy movement. *Convergence, 20*, 438-460.
- Boykoff, J. (2006). *The suppression of dissent: How the state and mass media squelch US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Brym, R., Godbout, M., Hoffbauer, A., Menard, G., & Zhang, T. H. (2014). Social media in the 2011 Egyptian uprising.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5*, 266-292.
- Buechler, S. M. (2011). *Understanding social movements*. Boulder, CO: Paradigm.
- Castells, M. (2012).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Cambridge, UK: Polity.
- (2009).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1). *The Internet galax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 and socie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 J. M., & Lee, C. C. (1984). Journalistic paradigms on civil protests: 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In A. Arno & W. Dissanayake (Eds.), *The news media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p. 249-276).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Coopman, T. M. (2011). Networks of dissent: Emergent forms in media based collective ac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8*, 153-172.
- Earl, J., & Kimport, S. (2011). *Digitally enabled social change: Activism in the internet 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Earl, J., Kimport, K., Prieto, G., Rush, C., & Reynoso, K. (2010). Changing the world one webpage at a time: Conceptualizing and explaining Internet activism. *Mobilization, 15*, 425-446.
- Eltantawy, N., & Wiest, J. B. (2011). Social media in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Reconsidering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 Communication*, 5, 1207-1224.
- Ems, L. (2014). Twitter's place in the tussle: How old power struggles play out on a new stag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6, 720-731.
- Forde, S. (2011). *Challenging the news: The journalism of alternative and community media*.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ladwell, M. (2010).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The New York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0/10/04/small-change-malcolm-gladwell>
- Hara, N., & Huang, B. Y. (2011). Online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5, 489-522.
- Harlow, S. (2012).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s: Facebook and an online Guatemalan justice movement that moved offline. *New Media & Society*, 14, 225-243.
- Holbert, R. L., Garrett, R. K., & Gleason, L. S. (2010). A minimal era of media effects? A response to Bennett and Iyenga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60(1), 15-34.
- Howard, P. N., & Hussain, M. M. (2013). *Democracy's fourth wave? Digital media and the Arab Spring*.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mel, S. H. (2014). Egypt's ongoing uprising and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s there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20, 78-91.
- Kolb, F. (2007). *Protests and opportunities: The political outcomes of social movements*. Frankfurt, Germany: Campus Verlag.
- Lee, F. L. F. (2015). Social movement as civic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nd understanding of civil disobedience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393-411.
- Lee, F. L. F., & Chan, J. M. (2011). *Media,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The power of a critical event (Media,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Asia)*. London, UK: Routledge.
- Leung, D. K. K., & Lee, F. L. F. (2014). Cultivating an active online counter-public: Examining usage and political impact of Internet alternative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9, 340-359.

- Lupia, A., & Sin, G. (2003). Which public goods are endangered? How evolving technologies affect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Choice*, 117, 315-331.
- Macafee, T., & de Simone, J. J. (2012). Killing the bill online? Pathways to young people's protest.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5, 579-584.
- McCarthy, J. D., & Zald, M. N.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212-1241.
- (1973). *The trend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 McChesney, R. W. (1999).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 New York, NY: The New Press.
- McLeod, D. M., & Hertog, J. K. (1998). Social control and the mass media's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protest groups: The communicative acts perspective. In D. Demers & K. Viswanath (Eds.), *Mass media, social control and social change* (pp. 305-330). Ames, I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Mercea, D. (2014). Towards a conceptualization of casual protest participation: Parsing a case from the Save Rosia Montana campaig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28, 386-410.
- Milkman, R., Luce, S., & Lewis, P. (2013). Changing the subject: A bottom-up account of Occupy Wall Street in New York City. *CUNY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Retrieved from [http://sps.cuny.edu/filestore/1/5/7/1\\_a05051d2117901d/1571\\_92f562221b8041e.pdf](http://sps.cuny.edu/filestore/1/5/7/1_a05051d2117901d/1571_92f562221b8041e.pdf)
- Olorunnisola, A. A., & Martin, B. L. (2014). Influences of media on social movements: Problematizing hyperbolic inferences about impacts.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30, 275-288.
- Passy, F. (2003). Social networks matter. But how? In M. Diani & D. McAdam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ssy, F., & Giugni, M. (2000). Life-spheres, networks, and sustaine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political commitment. *Sociological Forum*, 15, 117-144.
- Penney, J., & Dadas, C. (2013). (Re)Tweeting in the service of protest: Digital composition and circulation in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New Media & Society*, 16, 74-90.

- Rohlinger, D. A. (2002). Framing the abortion debate: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media strategies, and movement-counter-movement dynamic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3, 479-507.
- Ryan, C. (1991). *Prime time activism: Media strategies for grassroots organizing*. Boston, MA: South End.
- Small, M. (1995). *Covering dissent: The media and the anti-vietnam war movement (perspectives on the sixties serie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Tang, G. (2015). Mobilization by images: TV screen and mediated instant grievances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338-355.
- Tang, G., & Lee, F. L. F. (2013). Facebook us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impact of exposure to shared political information, connections with public political actors, and network structural heterogeneity.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31, 763-773.
- Theocharis, Y. (2013). The contribution of websites and blogs to the students' protest communication tactics during the 2010 UK university occupati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6, 1477-1513.
- Thorson, K., Driscoll, K., Ekdale, B., Edgerly, S., Thompson, L. G., Schrock, A., et al. (2013). YouTube, Twitter and the Occupy Movement: Connecting content and circulation practic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6, 421-451.
- Tremayne, M. (2014). Anatomy of protest in the digital era: A network analysis of Twitter and Occupy Wall Street.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3, 110-126.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Tufekci, Z. (2013). "Not this one": Social movements, the attention economy, and microcelebrity networked activism.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7, 848-870.
- Tufekci, Z., & Wilson, C. (2012). Social media and the decision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protest: Observations from Tahrir Squa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 363-379.
- Valenzuela, S. (2013). Unpacking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protest behavior: The roles of information, opinion expression, and activism.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7, 920-942.
- Valenzuela, S., Arriagada, A., & Scherman, A. (2014). Facebook, Twitter, and youth engagement: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of social media use and protest behavior



- us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2046-2070.
- van Dijck, J. (2009). Users like you? Theorizing agency in user-generated content.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1, 41-60.
- Walgrave, S., & Verhulst, J. (2011). Selection and response bias in protest surveys. *Mobilization*, 16, 203-222.

# Power and Strength of Networked Media and Connective Action: The Case of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Francis L. F. Le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bstract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late 2014 was not only the largest civil disobedience campaign in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but also exhibited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 and “connective action,” including the prevalence of digital media as a tool for mobil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digital media and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can empower a movement through allowing wider participation, but simultaneously can lead to decentralization of a movement, increasing the difficulty of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by movement leaders. Analyzing data from an onsite survey of protesters, the article shows the extent of participant participation in digital media activities. Digital media activities are found to relate positively to involvement in the occupied site, which is related to lower willingness to listen to the movement leaders regarding questions of movement strategy. The study thus illustrates both the power and challenges brought to social movements by digital media and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Keywords:** 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 connective action, tendency of decentralization, digital media, the Umbrella Movement

---

\* Email: b200152@mailserv.cuhk.edu.hk

Received: 2015.06.15

Accepted: 2015.10.17